

[ZHONGGUO
FANGYI
SHI

中国防疫史

● 邓铁涛 主编

Deng Tietao Zhubian

《中国防疫史》是国内第一部详尽记述我国防疫历程的学术专著。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邓铁涛 主编

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防疫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防疫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全书共分五卷，系统介绍了我国防疫工作的历史、现状、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专著，也是一部科普读物，对于广大读者了解我国防疫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肺炎

肺炎是一种由细菌、病毒、真菌等病原体引起的肺部炎症。其临床表现多样，轻者仅表现为咳嗽、咳痰，重者可出现高热、胸痛、呼吸困难等。肺炎的防治关键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肺炎的防控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确保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科学研究项目(05JAZH005)成果

中国防疫史

防疫史》是国内第一部详尽地
想上超越了陈鹤楚的著作。用
论解释政权的更替。《经济感
聪明的人民在历史中
聪明了睿智。本书海纳百川，集百家之言，汲源而上，发精而
史学考证细致入微，言必有据，不牵强附会，妄加评论，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贯彻始终。对于近
是本世纪初对世界各国影响较大的烈性传染病霍乱非典型肺炎作了较为客观、正面的评
彰显了我国政府和人民在抗
典中所做出的举世公认的贡献。

《中国防疫史》编委会 主编：邓铁涛 副主编：郑洪 陈志勇 刘小斌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邓铁涛 龙文醒 刘小斌 刘成丽
朱金江 陈志勇 陈朝晖 李健明 郑洪 林沁臻 徐信义 覃百长 程宾
特约编审：张葆全 蒋玲玲 郑维宽 利来友 亢霞生 顾绍伯 刘义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防疫史/邓铁涛主编.—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1

ISBN 7-80666-578-1

I. 中... II. 邓... III. 防疫—医学史—中国
IV. R1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3229 号

中国防疫史

主编:邓铁涛

出版: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南宁市东葛路 66 号

邮政编码 530022)

发行:广西新华书店

印刷:广西民族印刷厂

(南宁市明秀西路 53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出版日期: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mm × 1240mm 1/16

印张 47.25 彩图 4 页 字数 1 360 000

ISBN 7-80666-578-1/R · 87

定价:18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珮云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

中国防疫史

彭珮云



彩图1 古代城市已有良好的排污设施,图为河南虢国都城遗址的下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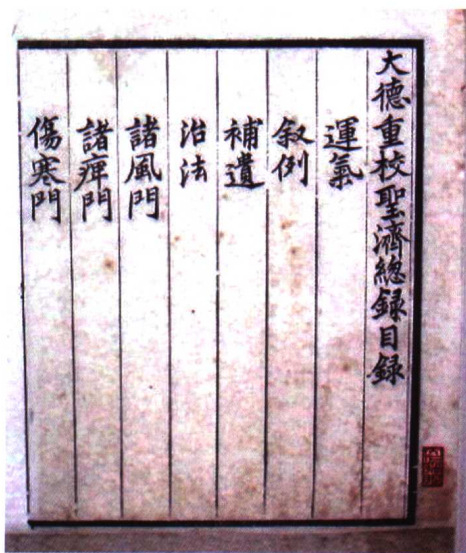
彩图2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青铜冰鉴,是古代的“冰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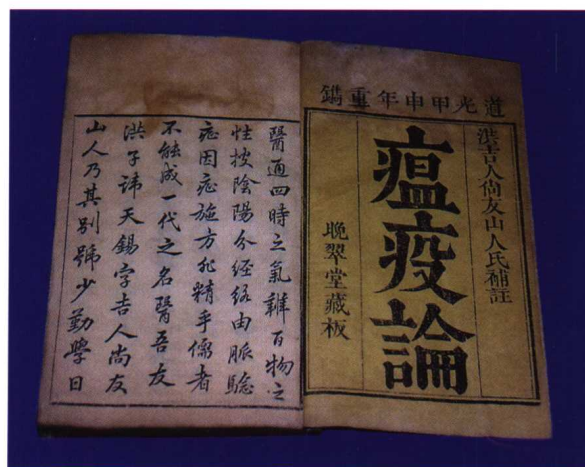
彩图3 汉代厕所明器,厕所下面是猪圈,引自《中华医学文物图集》



彩图4 敦煌壁画《悉达太子洗浴图》(佛教非常重视洗浴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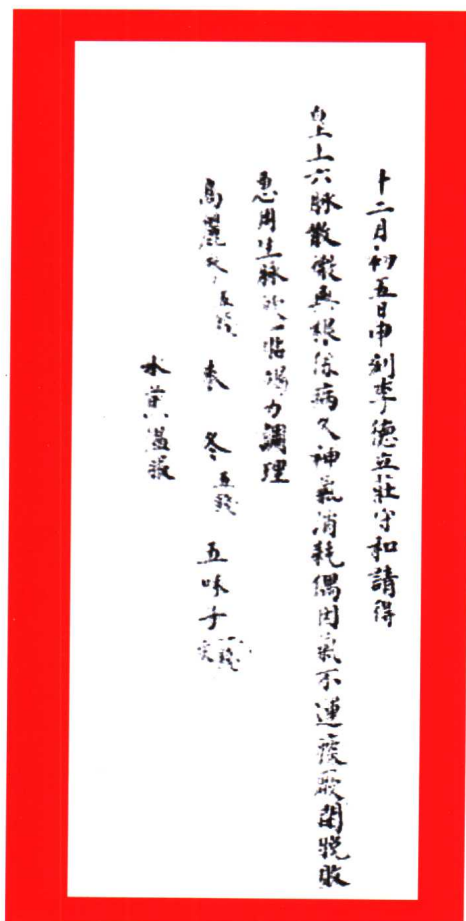
彩图5 宋代重视运气学说预测疫病,宋徽宗主持编修的《圣济总录》置《运气》于卷首



彩图6 明末吴有性《瘟疫论》书影



彩图7 邱煊著《引痘略》，用传统医理阐释牛痘术



彩图9 清同治帝患天花的临终脉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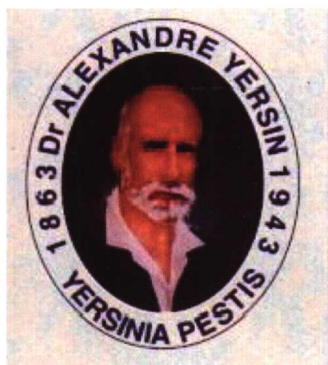
彩图8 《引痘略》增订版本之一，封面绘清末牛痘局接种情况



彩图10 罗汝兰《鼠疫汇编》是关于防治鼠疫的重要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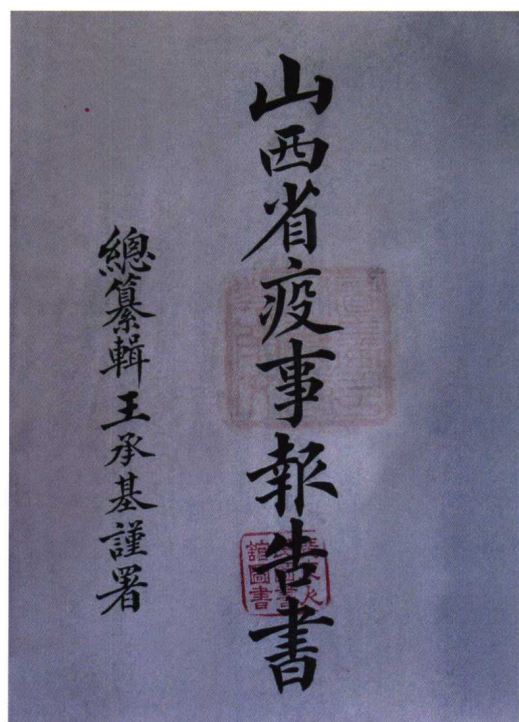
彩图11 1894年香港发生鼠疫后，疫区太平山一带被拆毁，改建成公园



彩图12 1984 年在香港发现鼠疫杆菌的
法国科学家耶尔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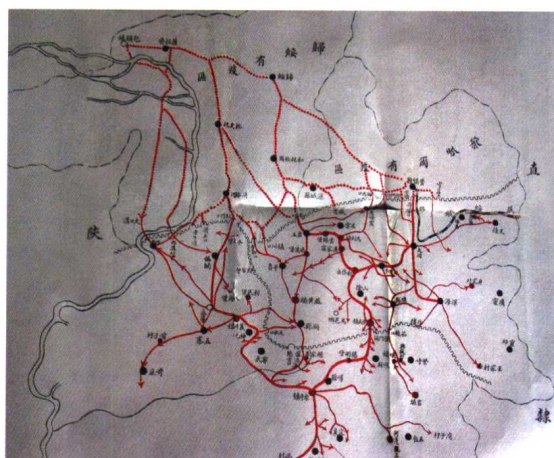
彩图13 《东北防疫处报告大全书》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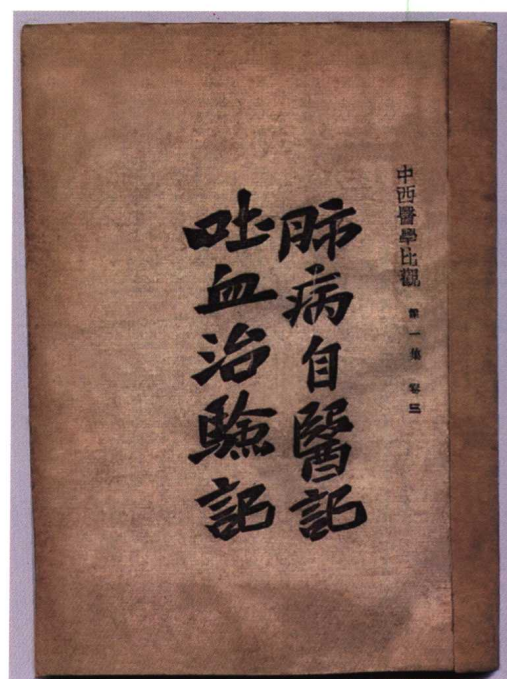
彩图14 记录 1917~1918 年山西防疫情况的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彩图16 民国防痨邮票,上有红色
防痨协会标志



彩图15 1917~1918 年山西鼠疫传播线路图,见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彩图17 張公讓《肺病自醫記·吐血
治驗記》书影



彩图18 1945年广州致香港有关预防天花的公函



彩图20 朝鲜战争中美国空军战俘伊纳克、奎恩的供词录音,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出



彩图19 朝鲜战争中缴获的美军细菌战容器



彩图21 1958年香港关于白喉接种的宣传画



彩图 22 1998 年抗洪救灾中医护人员为灾民防病,引自《'98 抗洪大纪实》

彩图 23 1998 年抗洪救灾中为灾民消毒饮用水,引自《大灾之后无大疫》



彩图 24 2003 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探访北京地坛医院,与艾滋病患者握手

彩图 25 2003 年 SARS 流行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广东的抗疫机构,与前线防疫人员亲切交流



■ 序一

2003 年的 SARS 风暴之后，人们重新关注起传染病（古代称为疫病）的问题。事实上，从远古开始，传染病就与人类社会始终相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医学水平的提高，传染病的危害尽管已经减小，但远未离开人们的视野。

中国自古代以来，就凭借先人的经验积累与理论认识，与传染病展开了持续的斗争。邓铁涛教授主编的《中国防疫史》一书，综合了大量史料和研究成果，为人们展现了历代劳动人民和医学家防治传染病的情形，这对我们更完整地了解中华民族繁衍成长的历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一些历史事件、战争胜败，也可以从传染病影响的角度得到新的认识，这又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从 19 世纪开始，西方生物医学的进步，使传染病的防治出现了重要转折。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防疫事业的发展。在 20 世纪，尤其是 1949 年以后，通过新中国数十年的努力，大多数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中国防疫史》一书回顾了这百余年来的艰难历程，对新中国的防疫事业给予了充分肯定。

如果与历史相比较，2003 年的 SARS 疫情也许还不算最严重。但对 SARS 的研究表明，人类社会还随时可能面临各种新出现的传染病。这说明我们的防治工作必须常抓不懈，并且要与时俱进。抗击 SARS 期间，我国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就表明中国的公共卫生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除了急性传染病之外，我们还必须知道，众多慢性传染病也在不停地向人们侵袭。这些疾病有被称为“世纪瘟疫”的艾滋病，有重新抬头的肺结核、血吸虫病等。此外还有乙型肝炎，在我国感染者众多，

病毒携带者高达 10%，这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如果不在心理上和技术上对慢性传染病给予充分重视，将来的影响还将更加严重。正是出于对此的重视，《中国防疫史》一书不但记述历史，而且触及现实，在回顾过去的同时，更正视 21 世纪的重大挑战，这使本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都大为增加。

了解过去，方知道今日来之不易；直面现实，才能迎接未来的挑战。《中国防疫史》一书并不只是汇列统计数据和医学资料，而是有史有论，我想它不仅对卫生防疫人员或历史学工作者有参考作用，对关心中国社会和卫生状况的人们也是一本有价值的专著。

中华医学会会长 钟南山
中国工程院院士

序二

中国疫病流行与防治的斗争，几乎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同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外交流渐趋频繁，加之兼并战争与反侵略战争，使国内外交流之规模逐渐扩大，疫病的流行也更加猖獗。特别是烈性传染病鼠疫、天花、霍乱由境外传入，给我中华民族以极大的杀伤。令人欣慰的是，对鼠疫，中国诗人师道南指出：“人见死鼠如见虎”，警示人们预防之；“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居民防鼠患意识日益增强；加之古代早已形成之灭蚤等环卫措施，使鼠疫在中国之灾难明显不如国外残酷。对天花，中国医学家在传入之初，便强调了“稀痘法”防治思想，尤以唐代孙思邈创造性运用中国“以毒攻毒”思想为指导，为病人接种脓毒以预防化脓感染性疫病，此法与人痘接种法十分接近。我们研究认为：用天花患者脓痂接种以预防天花的方法，应当也在此时萌发。必须指出，中国唐宋时期医家用以“稀痘”等防治天花的方药，数以百千计，无疑大大降低了天花的传染与病死率。再说霍乱，传入中国是19世纪初的事，我们历来有“病从口鼻而入”的警戒，数千年来一直很重视饮水、饮食卫生和环境卫生，又有防治消化道泄泻等疾病的丰富理论与经验积累。因此，该病在中国流行也不如境外之烈。与此相反的是，在国外，鼠疫一次流行能造成1/5甚至1/2以上人口的死亡，有的城市病死大半。天花肆虐使阿兹台克帝国2500万人在10年内竟然死了2000万人，致使帝国消亡。几个原有数百万人的印第安部落，由于天花肆虐而仅存数千人，甚至完全灭绝。霍乱之杀伤力较鼠疫与天花虽然小一些，但也属于烈性传染病，其死亡率在国外也比较高。欧洲历史上最悠久的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竟因霍乱大疫而颓然倾覆，令人非常恐惧。

相对而言，烈性疫病传入中国，在中国人毫无免疫能力的情况下，不但未造成比其原发地严重的倾城倾国，而且由于中国人历代形成的先进文明和名医名术，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提高认识，在斗争中提高与改进技术手段，无论鼠疫、天花与霍乱，都没有造成如国外那样高的死亡率。

例如晋代葛洪开创了杀死狂犬取其脑，用以敷被其咬伤的人的伤口，预防狂犬病发作；以及用口服或外敷沙虱预防沙虱（恙虫病）等方法。这些探索虽然比较原始，但此尝试无疑应该是有效的，是免疫理论与技术之先驱。至于在与烈性传染病斗争中创造发明的中国人痘接种术，经俄罗斯、土耳其等传遍了世界各大洲，曾使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得益……使天花的肆虐逐渐减弱。这个历史史实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中国人战胜疫病的历史记录是无上光荣的，无愧于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是对人类科学进步的重大贡献。

中国人防治疫病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有数千年的记述。从现代意义进行的总结与规律性研究，以论文发表而言，也有了百年的历史。如《医学卫生报》（1909年）发表的《肺癆传染史》，《中西医学报》（1910年）发表的《鼠疫之历史》，《东方杂志》（1919年）发表的《流行性感冒之历史研究》，《同德医学》（1922年）发表的《考痘（天花）》，等等。中国医学史研究之开拓者陈邦贤先生，于1919年完成了中国医学史上的首部医学编年史，即以专编论述了中国疾病史，并将传染病史列于首章，论述了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疟疾、天花等14种疫病史。陈先生还于1932年应聘在江苏医政学院开设讲授传染病史与防疫史的课程。这些开拓性的疫病史研究，发掘了许多史实，为我们奠定了方法学基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为国家消灭和控制传染病大政方针服务时，我和同事们一起曾对疟疾史、传染性肝炎史、痢疾史、流感史、天花史等进行了系统的古文献调研，积累了大量的史料，草拟了每种传染病10万~20万字的论著，在此基础上又发表了“述要”。80年代我又鼓励我的一个学生以《中国疫病史》为题，完成了硕士论文，同时她还完成了3000年的《中国疫病流行年表》，十分可贵。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此类课题在20世纪的最后年代，几经努力仍未能得到立项与资助的机会，资料被束之高阁，激情渐趋冷落。然而，我始终没有动摇对系统研究“中国疫病史”重要性的认识，没有动摇全面探索中国医学家在战胜疫病卓越贡献方面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的信念。因此，当我读到邓铁涛教授主编的《中国防疫史》一书，洋洋百余万字，上下五千年，有史实，有史论，内容丰富多彩，真是欢愉之心，无以言表。我衷心祝愿大作宏著快快出版面世，不折不扣地发挥其伟大的历史使命。也正因为此，我对邓老也更加尊重，他为我们与子孙后代又做了一件大好事。

近年来每每看到邓老为中医学发展正本清源，奔走呼号，身体力

行，每每实现大手笔、大举措，无不令人感动而欲追随其后。现已 90 岁高龄的邓老，不但勤奋于临床疑难病证之治疗和研究，而且在不知疲倦地指导中医学博士与博士后之余，更是夜以继日地笔耕不辍。

邓老对我来讲，亦师亦友。我与邓老相识，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合作编撰大、中、小型中医工具书，至今已有 30 多年。在这 30 多年中，我向邓老请教疑难问题已算不清次数了，不但包括中医学内容，更有医史学难题。20 世纪 90 年代，我特邀邓老参与和指导《中国医学通史》巨著编撰。因为邓老长我十多岁，他对中国近代医学史中的事件大多亲身经历，每每谈起令人感到似若亲临其境。如果说我在半个多世纪的耕耘中，曾有所成就的话，邓老是我事业之友，更是我事业之师。邓老 30 多年来每一次的举措，都鼓舞、鞭策着我的奋进、追赶与效法。

2006 年春节前夕，邓老给我一函，嘱咐我为他主编的《中国防疫史》巨著写序。览读其内容，令我吃惊。90 岁高龄的邓老，思维活泼敏捷，逻辑规范，井然有序，史实调研极其丰富，论述流畅，有理有据，使我们可以从中借鉴前人防疫非常光辉的经验，当然亦有教训。

《中国防疫史》一书结构科学，自先秦、秦汉至清代中、晚期，由中华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由香港、澳门到台湾，上下五千年之卫生、疾病、防疫法、卫生管理、疫情、疫病治疗医学，现代公共卫生防疫管理，现代卫生防疫指导方针、体制、防疫法，等等，条分缕析，历史发展脉络十分具体，光辉史实历历在目，重大发明与防治疾病之医理医法，尽显于读者眼前。特别是作者对 2003 年抗击 SARS 之总结，对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投巨资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记述，十分有时代感。书中肯定了中国医学防治 SARS 的成功表现，这一事件为促成中国传染医学在世人面前再现辉煌拉开了序幕。

《中国防疫史》一书为我们借鉴中国古代防疫之成功经验与不足，提供了一面巨大的镜子。回顾 20 世纪上半个 50 年，在中国医学的发展中，由于错误的认知，在卫生方针上实行了全面西化的政策。中国卫生管理机构的某些官员，看不到也不愿意借鉴中国人自己千百年实践的真知灼见。中医界也无能为力地处在中国传统医学求生存而疲于奔命、为保留而奋斗的境况下，从而失去了发展有中国医学特色的疫病防治、卫生管理模式的机遇。事实上，中国传统医学在对抗疫病方面早有系统认知，如讲究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严堵病从口鼻而入、严格隔离、深埋疫尸、捕杀疫源、高温消毒衣物餐具……现代防疫卫生管理体制之种种举措，我们先人似都已有创造和应用。严重错误的是，近代防疫中卫生管理唯西方制度、经验技术为是，虽然有中医争议，有医史学提供古人经验，却被某些卫生官员视之为落后。他们虽然也承认中国古代医学确有成就，但不认为有借鉴意义。人们的头脑中，只认为西方的学术与管理体制才是科学的、现代化的。这种偏见

长久以来始终未能得到科学的解决。我希望通过抗击 SARS 的经验总结，认真研究中国防疫史上的经验与教训，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疫病防卫体制。

读《中国防疫史》书稿，感慨良多。邓老嘱咐我写序，不知何由而信笔写了许多往事，作为一名医史学者的感知。这些是我读了《中国防疫史》书稿后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用以为序也许并非有失。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李经纬

■ 序三

疫病是对人类健康威胁最大的疾病，防疫则关系到民族昌盛、社会安宁、国家兴旺，因此世界各国共同把防疫这件大事作为永恒关注的课题。在我国，许多医学家、史学家鉴于研究中国防疫史不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多年来倾注精力从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撰著专题论文者有之，写作专著者有之，在医学通史中加重分量阐发者亦有之，今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像邓铁涛教授主编的《中国防疫史》这样时空跨度久远宽广，内容全面系统，采摭史料宏博，立论中肯审慎，既可作为防疫工作的参考书又可作为工具书者，并不多见。研读之后，收获甚丰，不仅开阔了知识面，而且汲取不少有益的经验教训，足兹为广大读者推荐。其独具的特色，有以下几点：

一、博而求精。本书系一部编年史体裁的史书，首先注意了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使叙述层次分明，史实编排有序，重大问题阐明完整而汰除庞杂琐事。众所周知，我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近世相继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河套人、山顶洞人等新旧石器时代多种早期与晚期智人的人骨化石出土，生存年代最早者在 170 万年前左右，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在 5 000 年左右，且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从未中断。本书研究的时空跨度自远古原始社会以迄 21 世纪的 2004 年；研究的范围遍及我国领土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它分时代首述时代背景、疫情概况、防疫举措，史料以正史、方志、政府公报、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专题调查报告、国际法庭的审判报告为主；对疫病认识的提高、防疫的学术成就则以医学典籍、专著为主，辅以相关的出土简牍等文物、文、史、哲、报纸杂志、笔记、回忆录等文献资料。为

提高引证文献的精确科学,严谨考证,均引出全文,注明出处。对特殊重大事件则详叙背景、经过、举措,有的附以照片,以兹深入研究,如唐山大地震、日寇细菌战、抗击 SARS 等。

二、论而中肯。本书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防疫工作均有讨论,阐述自家观点。其论有的寓议于述,有的夹叙夹议,重要的另立段来论述,其态度则依据史料是否充实有力,实事求是地加以区分。如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圣济总录》《小儿药证直诀》《温疫论》及清代的温病著作等,对其防疫思想与具体学术成就,均点出贡献所在;对在我国多次肆虐的传染病如天花、疟疾、急慢性血吸虫病、恙虫病、麻风、结核病、麻疹、白喉、鼠疫、真性霍乱、梅毒等性病均论证了传播途径、防疫举措的得失;对历史上有争议的如运用五运六气推算疫病流行情况、方药预防疾病效果、隔离疫病的伦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异议较多、证据不足者则留待今后研究,采取诸说并立,给后来者以广阔探讨空间。如三国曹操兵败赤壁,其军中流行之疫病,有疟疾说、血吸虫说、斑疹伤寒说等,均作了介绍。对于观点确有不妥之处则据理论证,态度分明地加以驳斥。如对《伤寒杂病论》“只能治变通传染病,不能治严重传染病”的看法,作者不仅举出临床通过张仲景所创六经辨证、脏腑辨证的方法和治方治愈许多严重病证的事例,而且指出至今仍广泛应用于多种传染病而取得疗效,认为其功不可没。

三、鉴而为用。这部著作的宗旨,就在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作者以鉴而资治的精神,希冀于未来者厥有三事:

其一强调重视组织管理、培养人才,才能使“预防为主”的精神落到实处。认为古代防疫的缺陷主要是缺乏政府有力的组织领导和得力的人才,不为人民而为统治阶级服务,“罪己诏”“祈禳”“求雉”等荒唐之举是毫无用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举国上下防病治病,以人为本,使多种难以消灭的传染病迅速得到控制,实政府组织得力、施政为民之功。1994 年国家改卫生防疫部门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扩大了工作范围,应对突发事件更为有力。如能培养优秀的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执法等方面的组织管理人才,将其充实其中,将会更有效率和效果。

其二强调贯彻“中西医并举”,倡导中西医结合,要多培养拔尖的世界一流专家,使之不但善于汲取国际上的尖端技术、信息,而且能自主创新、解决难点。作者认为对于中医的疫病防治成就应予肯定,在古代社会作为主流医学,它已经作出了许多贡献。如“天人相应”的医学模式,“上工治未病”的预防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防疫观;恙虫病的发现、血吸虫病的急慢性临床表现与流行病学、天花的分型分期与水痘麻疹的鉴别;常山与青蒿治疟、黄连治痢、砒剂治